

〔俄〕E.德雷仁 / 著

世界共通语史

——三个世纪的探索

商务印书馆



世界共通语史

——三个世纪的探索

〔俄〕E. 德雷仁 著

徐 沫 译

杭 军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共通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俄)德雷仁著;
徐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866-3

I. 世… II. ①德… ②徐… III. 国际辅助语-语
言史-研究 IV. H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17130 号

世界共通语史

——三个世纪的探索

[俄] E. 德雷仁 著

徐 沫 译

杭 军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866-3/H · 736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95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3%

定价: 20.00 元

忆何增禧(徐沫)

胡 绳

我和徐沫可算是总角之交。因为我们建立友谊、交往密切是在 20 岁以前。那时当然我们很幼稚。我们共同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追求进步,萌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互相影响,互相切磋,在这中间建立了友谊。

我们是苏州中学初中部的同学,1931 年夏季毕业,我进苏州中学的高中。徐沫家境贫寒,不能继续上学,他考进了上海的中国银行当“练习生”。徐沫是他的笔名,本名是何增禧。

“九·一八”事变在 1931 年秋天发生,次年发生“一·二八”事变。继侵略东北之后,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国家的危难状态震撼着当时的青年。徐沫同在苏州的几个同学经常通信,交流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担心和希望。有时他回苏州家里,我们当然就有了聚谈的机会。渐渐熟悉了上海这个都市的徐沫带给我以新鲜的信息 and 知识。他曾不止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出版的报刊带到苏州。这时,我们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知道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并正在进行着艰苦的斗争,知道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我们对中国革命抱着虽然不明晰,然而真切的向往之心。我们也关心正在兴起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1933 年下半年,我转学到了上海徐家汇的一个中学。我和徐沫的来往更密切了。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和徐沫在一起。我们

一起在徐沫宿舍的小房间读秘密书报,一起到位于卡德路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徐沫在1933年已经参加了这个协会。我在苏州开始学习世界语是受他的影响。世界语那时对我们不仅是一种新鲜的语言,我们还把它当作打开革命眼界的工具。我们认识了在艰苦的条件下住在这个协会的简陋房子里坚持工作的乐嘉煊(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逝世),也认识了叶籁士、张企程和其他一些进步的世界语者。徐沫的世界语学得比我好得多,他在以后若干年间为进步的世界语运动做了很多工作。

那时在上海还有一个我们在初中时的同学,他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的名字叫徐荣华,后来改名许立。徐沫在进入中国银行后不久就和许立有了联系。党的秘密出版物就是从许立那里得来的。我到上海后,许立有时也来看我和徐沫,除给我们看一些报刊外,还让我们帮他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许立在1936年被捕,抗日战争爆发后才从监狱里出来,继续为党工作。六十年代初他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不幸在壮年时病逝。

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应该是1933年11月20日),徐沫忽然到我学校来,告诉我一个刚刚得到的消息:因在上海抗战而著名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和其他一些人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报纸上还未透露这个消息,银行经过自己的渠道先知道了。我们感到,这个突发事件对国民党统治者是一个重大打击,对于在江西的红军显然是有利的,因此很高兴。不久后,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当然使我们很失望。我们只是简单地确信革命终将胜利,但是对于时局进行分析是我们所做不到的。

1934年夏天我从高中毕业。暑假里我住在徐沫的宿舍里,准

备大学的入学考试。那时北平的著名大学在上海设有考试点。徐沫在银行里做“练习生”好像已期满,成为低级的职员。他为了避免和银行的同事不必要的接触,不再住在银行宿舍里,另外租了房子(当然只是一小间)。这年暑假是住在一家肉铺的楼上,每下楼来就有一股屠宰场的气味扑面而来,楼梯扶手上也似乎都是油腻。

我在北京上了一年学,又回到上海,结束了学校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在这两年间,有几个月我和徐沫曾同住在一起。在当时“法租界”的环龙路住过,在“英租界”跑马厅附近住过。我们都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语联”(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并因而接触到党在文化工作上的领导机构“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个别负责人。胡乔木是“文总”的负责人之一。他在这时认识徐沫和我。记得有一次他到我们住的四层楼的阁楼上来和我们谈话,还在那里借宿一宵。

徐沫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和四年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上海中国银行供职。他也一直同党组织或党的外围组织有联系。抗日战争把我和徐沫隔绝了。直到1946年我在上海工作一年时才又遇到徐沫。再以后,和他会见已经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了。虽然同在北京多年,但是因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见面的机会很少。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暴风雨,他显然和别人一样,是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在暴风雨袭来的一开始,他就受迫害含冤而死,那时他才50岁。我知道他不幸的结局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徐沫是个沉静寡言的人。在解放以前,他为了谋生而从事银行工作,钻研银行业务。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学马列主义。除世界语外,他还学好了英语,也学了日语、俄语。他一

贯地、悄悄地为进步的世界语运动、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奉献。他直接间接地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对于他所能接触到的共产党员和党所领导的组织,他尽力给以支持帮助。他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在解放前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他从不在任何情况下炫耀自己做过些什么工作,解放后他还是保持这种品质。他甘于默默无闻地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和工作。在上海解放时,他与银行中的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为人民政府接管银行做出了贡献。这以后,他继续在银行工作。多年来,他在外汇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是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因此他极其勤奋地钻研他的业务。解放前,他是为坚持自己的革命信念而从事业余的工作,解放后,他同样是为坚持自己的革命信念而从事他的业务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诬蔑徐沫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种说法实在令人愤怒。徐沫只有初中的学历,通过自学使自己成为具有较高业务理论水平和广博的文化知识的人。他能把他在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外汇业务中的经验和知识整理和提高,既在高等学校中讲课,还写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结算方式》的专著。我没有能力评价他的这些成就。但应该承认,他即使不能称为“权威”,至少也是这个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专家,这样的专家本来只应该受到爱护,而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摧残。说他是“资产阶级”吗?他在解放前的银行中,从“练习生”做起,十七八年不过是个普通职员,他持久不懈,甘冒风险地为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他从不吹嘘自己曾为革命做过些什么,只是一心一意地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他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们也不必再使用过去人们曾用过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样的说

法,但应该承认,他的一生是革命战士的一生,是一贯和党走一条路的战友。

一场根本不应当发生的暴风雨吞噬了不少本来还可以大有作为的共产党人和党的战友,其中有我的朋友徐沫,这使人想起来就痛心。

这场暴风雨的确提供给我们深刻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为使这种不应当发生的事不再发生,我们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做许多工作。有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文化大革命”这一畸形的历史现象攻击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我相信,牺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共产主义战士,如果还活着,也不会同意而且要坚决驳斥这种错误的观点。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教训实际上有两层。在“左”倾的指导思想下搞“大民主”,搞“阶级斗争”,结果造成无政府状态,搞乱了社会主义,恰好为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和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造成活动良机。这一层教训是明显的。另一层教训是,如果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削弱以至放弃党的领导,结果一定不会有什么“民主”,而只是比“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为此我们就会付出比“文化大革命”多几倍、几十倍的代价和牺牲。这是我在缅怀徐沫和类似的其他朋友时想说的话。

译 本 序

陈 原

校印这部译作,出于三重考虑。首先,由于本书是这个学术领域的权威著作,其材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迄今仍无出其右。其次,为了纪念两个真诚的学人,作者德雷仁的和译者徐沫,他们都是悲剧时代的牺牲者。最后,为着实现胡愈之和叶籁士两位长者的愿望,他们生前曾力促这部译作能与中国的读者见面。

先说书。

这部著作研究的对象是国际辅助语的思想发展历史,属于语际语言学的范畴。“语际语言学”这个术语,是三十年代初由举世闻名的丹麦语言学大师耶斯佩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在《国际通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杂志上发表的专门论文首次提出的,原文为 Interlinguistics;他把这个术语定义为“研究一切语言的构造和基本观念,目的在创立一种跟各种语言并存的、能说能写的辅助语言”。

古往今来,或者说,自从巴贝尔通天塔的梦破灭以后,多少哲人怀着尊重、继承、沟通和交流人类文明成果的崇高愿望,年复一年地设计能被各族人民接受的共通语或辅助语;其中也包括耶斯佩森——他曾创制过一种叫做“诺维亚尔语”(意即“新国际辅助语”Novial)方案(1928)。事实上,多少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它牵涉

到很多复杂因素,包括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国家的、文化传统的,等等;只有很少几种人工创造的辅助语方案曾在世界上一部分人中间流行过,而流通得最广的当推波兰柴门霍夫创始的“Esperanto”(我国通常译作“世界语”),在它问世后的一百多年间,拥有比较多的普通群众的爱戴,由是获得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战后又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支持。德雷仁的这部专著,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检阅和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哲人、各种国际辅助语方案的观念、结构和得失,是人类创制国际语的历史总结。从来这类研究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而德雷仁的书则不仅作语言学的探索,而且作社会学的探索,这是其他同类专著所不及的;它之所以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国家翻印了多次,其原因盖在于此。

本书作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那时马尔的语言理论正在走红,马尔本人也热衷于这个学科的研究,故他特地为本书俄文第一版写了序文。因此,本书在头一章中论述了并肯定了语言阶级性的论点,这些章节,译本仍保存着,相信读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批判了马尔的这种错误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此马尔好像就一无是处了;其实马尔关于语言的人工性(即语言文字系统有可能加以人工调节)的论点,正是语际语言学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语言规划或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本书在信息时代重印,仍不失其学术意义。

第二,关于作者。

德雷仁(Ernest K. Drezen, 1892—1937)是从红军军官转到科学研究领域来的,他是当代国际术语学的创始人之一,跟现在被

称为术语学鼻祖的奥地利工程师欧根·维于斯脱(Eugene Wüster)一起,创立了国际标准化协会(ISA),即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前身。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世界语学者,并且都是从世界语运动走向术语标准化和术语国际化的研究工作的。维于斯脱同德雷仁过从甚密,包括频繁的通信和国际会议的商讨。德雷仁在三十年代上半期是当时苏联科学院术语标准化委员会的负责人,常常代表苏联术语学界出席国际会议。他又是全苏联世界语联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上的经历和工作,导致他在肃反扩大化中被诬为“人民公敌”,以“里通外国”罪名被捕(1937年4月17日),半年后即被处决(1937年10月27日),死时才45岁。二十年后才得平反(1957年5月11日)。

据我所知,国人见过德雷仁的只有胡愈之。在他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中《D同志的家庭》和以下的几节所提到的“D同志”,就是这个德雷仁。那是1931年的事了,1935年至1936年我因热衷于研究工程术语的移译问题,读了德雷仁关于科学技术术语国际化的论文,曾写信向他请教,因此通过一两次信;但1937年我寄去的信件都被退回,加盖了“无此人”的图章,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那时他已遇难,不过当年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就是了。

第三,关于译者。

译者徐沫,原名何增禧(1916—1966),我跟他只见过几面,但印象却极深刻,是个质朴的严肃的学者。他的至友胡绳对他有过一段很确切的描述:

徐沫是个沉静寡言的人。在解放以前,他为了谋生而从事银行工作,钻研银行业务。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

知识,学马列主义。除世界语外,他还学好了英语,也学了日语、俄语。他一贯地、悄悄地为进步的世界语运动、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奉献。他直接间接地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对于他所能接触到的共产党员和党所领导的组织,他尽力给以支持帮助。他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在解放前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他从不在任何情况下炫耀自己做过什么工作,解放后他还是保持这种品质。他甘于默默无闻地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和工作。

这部大书是他在三十年代初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来的,其中个别章节曾在叶籁士主编的《世界》杂志附刊《言语科学》上发表过——这通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稿子一直未能出版。解放后,徐沫专心做他的银行业务,到六十年代已成为熟悉国内和国际情况的外汇问题专家。然而那场荒唐的“革命”,连这样一个学者也不放过;他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位真诚的学者,经不住种种折磨,只得用原始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1966年8月24日走完了他五十年人生道路。

好容易熬过十年。绝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毕生致力于国际语的理论与实践的两位前辈,胡愈之和叶籁士,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同我讲过多次,让我设法促成这部译稿面世;叶籁士百病缠身,仍打算为中译本写一篇序言——直到他弥留时还记挂着此事。如今胡老叶老先后走了,我却已没有精力完成译稿的校订工作。随后我征得译者的遗孀康继琴同志的同意,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领导硬逼着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组的杭军同志,挤出大半年的业余时间,将译稿校订一遍,最后由我在浏览全稿时解决了若干翻译上的疑难,算是定稿了。商务印书馆这家老店不

10 世界共通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

怕捞不回成本,毅然将此书列入选题计划——这时,直到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部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译稿,这部有世界声誉的专著,终于有机会同中国的读书界见面了;而我也终于能向几位可敬的师友偿还“债务”了;但愿我活着时能看到它的样书。

1994年4月29日

目 录

忆何增禧(徐沫)	胡绳 1
译本序	陈原 6
前言	1
第一章 语言,其任务及其发展	4
第二章 语言发展的人工调整	17
第三章 十八世纪以前世界通用语早期试验及方案	34
第四章 十八世纪及这个时期的方案	70
第五章 1800—1850 年间的方案	100
第六章 1850—1880 年在沃拉匹克语出现前的方案	132
第七章 通用语沃拉匹克语	166
第八章 沃拉匹克语出现以后的各种任意的人造语	
方案(1880—1930)	186
万国通用符号语	187
手势和自然声音	198
先验方案	203
混合方案	215
第九章 对活的语言和死的语言进行世界通用化、	
修正及改革方案(1880—1930)	231
死的语言	232
活语言的简化	238

2 世界共通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

采用某种民族语作国际通用语的建议	250
类似方案的未来命运	252
第十章 1880—1907 年间合理的国际经验语方案	254
第十一章 世界共通语沃拉匹克语研究院及其继承者	
新拉丁语系统的通用语方案(1893—1930)	282
第十二章 世界语、国际辅助语选定委员会、伊斗语及	
其他改革方案(1900—1930)	304
第十三章 调和世界语与盎格鲁—罗马语系各屈折语的	
个人方案(1909—1930)	346
第十四章 国际生活和国际语(1907—1914)	367
第十五章 大战以后(1919—1930)	372
第十六章 现在的世界语, 未来的国际语和世界共通语	386
参考书一览表	393
人名译名对照表	396
语言名称译名对照表	406

前 言

我着手写这一部专事研究世界共通语思想发展历史和分析的书,还在二十年以前。现在读者诸君所见到的这一本,是我过去以俄文首次发表在《柯特林报》(Kotlin, 喀琅施塔得, 1911 年第 203—204 期)上的一篇论文第六次的修正和充实稿。

1922 年,经过了许多增补之后,这论文由苏联世界语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分印为三本小册子。1925 年,土地和工厂出版社第三次刊行,增加了不少篇幅,取名为《共通语的探索》。

在 1926—1927 年这一时期中,我彻底订正了我过去所写的关于世界共通语历史的一切著作。为此,我跑遍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去寻找那些有助于我的著作的文献和出版物。在这些深入研究过的资料“源泉”之中,必需特别指出的是收藏丰富的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国立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和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

与此同时,我还和许多世界共通语史专家通信,因此又获得了极多的新的例证和指教。从中锡惠特厚的是穆拉符金(H. Muravkin)和斯托扬(P. Stojan)二君。

结果在 1928 年,这本著作又第四次以俄文出版——这次的出版者是俄罗斯国家科学管理局(Glavnauka RSFSR),并蒙耶弗语理论的创始者苏联科学院院士尼·雅·马尔赐序。

这个新版本在能够读懂俄文的各国专家中引起了非常积极的

反响,并有许多人希望它能以世界语出版。

经过多次商谈后,我们决定把这本书的世界语译文先在世界语综合杂志《新时代》上连载,然后出单行本。于是从1928年10月起,它便逐期刊载在《新时代》上,直到1930年6月登完为止。

世界语译本是霍赫洛夫(H. Hohlov)完成的,校订者是N. 涅克拉索夫(N. Nekrasov)。然而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不止是翻译和校订。在1930年5月才结束的整个校译过程中,他们为本书增添了不少从来不为人知道的材料,以及若干种在1927年以后出现的新的语言方案。

当本书在《新时代》上连载完毕以后,《国际教育评论》杂志中肯地评论说:“世界语译本因作了大量新的补充,较之俄文原本已经大大地完善了。”这样,本书得以第五次扩充再版。

或者有人会想,本书既然连载完毕,那末单行本的出版,自是指顾间事,谁知事实并非如此。

因某种政治的和个人的考虑,SAT(全世界无民族协会)的领导人命令印刷所把本书的底版立刻拆散,甚至还要求在法律上对这种野蛮行为备案。

但是,正和时常可以看到的一样,这件事的结果与行事者的意图恰恰相反。

现在,正好是它第一次出版后的二十年,这本书(好几部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样子)得以第六次和世人相见了。它的形式和内容,比《新时代》上刊载的译本,又完善了许多。

《新时代》上的世界语译本,比俄文原本得到的反响更多。指正和增补的信陆续而来,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布达佩斯的齐拉格伊(D. Szilagyi)和汉堡的爱泼斯坦(F. Epstein)二君。1929年